

立冬至,我正在家吃饺子,手机屏幕滑过的视频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个男生晒出了学生时代“私人定制”的耐克包——红色书包上是黑线勾勒的“对钩”,内里小花烂漫、青草蔓延。配文只有短短18个字——“初中时想要耐克书包,妈妈便给我缝了一个”。就是这朴素的图文,几天内竟获千万量的点赞。

我下意识将视频拉回开头,点开放大,仔细打量那些细密的针脚。不知不觉间,饺子的热气模糊了眼镜片,也模糊了时光的边界。屏幕那端关于母爱的故事,就这么静静地漫过来,漫进了1991年的冬天,漫向那双被油漆染过的棉鞋——它已然在岁月里褪去最初的颜色,可关于它的记忆,却像炉边烤暖的空气,几十年过去,依旧带着熨帖的温度。

那是个能把人冻透的严冬。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像细沙磨过肌肤,呼出的白气来不及散开,就凝在眉梢成了霜。我那会儿刚上小学二年级,个子比同龄孩子高出大半个头,脚丫子也跟着“冒进”,母亲总说我这脚是“催着日子长的”,去年冬天刚买的棉鞋,今年就穿不进去了。那时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个月也就200块钱,除了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还要时常给西阳呈村的爷爷和北坞村的姥姥,姥爷捎些衣物和肉菜,每一分钱都得算着花。

最小的表姐婷婷比我大四岁,正上五年级。舅舅一家六口挤在海军招待所东北角的两间狭长的房子里。墙皮虽有些斑驳,屋里却总飘着饭菜的香气——妗子爱煮红薯粥,甜香能一直飘到院子门口。那里离我念书的五一路小学很近,放学后母亲常牵着我的手去过唠嗑儿。我也乐得去,表哥、表姐有什么好吃的总给我留着,连难得的水果糖也要分我半块,屋里传出的谈笑声,比自己家里都要热闹几分。

记得那年的雪来得特别早。刚进十一月,天就沉了脸,鹅毛雪片飘了整整一个下午,到傍晚时,连马路牙子都埋在了雪里。我的棉鞋是真的穿不上了,早晨穿鞋时脚趾挤作一团,走两步就疼得龇牙。母亲着急,每天放学接我,都要绕到鞋帽市场转一圈,可问遍了摊位,不是尺码不合适,就是要价太高——一双棉鞋要二十多块,抵得上家里一周的菜钱。

有天傍晚,母亲又牵着我去舅舅家。妗子正坐在小马扎上给表姐缝校服,看见我们来,赶紧起身倒热水。母亲捧着搪瓷杯哈气:“强这脚长得太快,去年的棉鞋没法穿了,市场上转了好几回,也没找着合适的。”妗子听了,愣了愣,忽然一拍大腿:“婷婷有双棉鞋,去年也没穿几次,今年她穿着小了,你看强能不能穿?就是……是姑娘家的红色,怕孩子不乐意。”

母亲眼睛亮了,催着妗子去拿鞋。从床底拖出鞋盒,打开一看,是双半高帮的红色棉鞋——鞋面上横着银亮的粘锁,里侧还缝着拉链,绒面厚实,摸上去软乎乎的。可那红色太扎眼了,是年画上新有的浓艳,我一个男孩子,怎么能穿红鞋?母亲把鞋递到我面前:“强,试试吧,看看合不合脚。”我往后缩着脚,极不情愿地把脚伸进去——鞋码竟意外地合适,不松不紧,暖意从脚底板慢慢漾开。可低头看见那抹红,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我的鞋上。

母亲和妗子看见我这样模,相视而笑。妗子忽然说:“要不咱给它改改颜色?”母亲怔了怔:“改颜色?咋改?”妗子往门外指了指:“家里有小半桶绿色的油漆,是之前刷窗户剩下的,还有点儿稀料,要不咱试试,把红鞋染成绿的?”母亲思忖片刻,点点头:“行啊,绿色耐脏,也显精神,像小军靴似的,孩子说不定喜欢。”

那会儿的人,过日子有股子“办法总比困难多”的韧劲。妗子很快找到油漆和稀料,找了个旧搪瓷碗,把油漆倒进去,再兑上稀料,用筷子慢慢搅匀。油漆的味道有点儿冲,妗子便把窗户开了条缝,冷风灌了进来,却没吹散两人说话的热气。母亲拿着鞋,妗子拿着碗,用旧毛笔蘸了漆,一点一点往鞋面上涂——红色的鞋面慢慢被绿色覆盖,像春天的草芽漫过冻土,渐渐有了新模样。她们一边涂,一边聊着家长里短,……笑声混进油漆味儿里,闻着竟也不觉得刺鼻了。

涂完油漆,鞋还湿着,为了防止鞋子上的油漆被蹭掉,妗子特意找了个大大的旧鞋盒,让母亲带回家晾。那时家家都靠蜂窝煤炉子取暖。母亲回到家,打开鞋盒,拿出一个竹夹子,小心翼翼地夹住鞋帮,放在炉子边烤。火苗在炉子里跳动,橘红色的光映在鞋面上,绿色的漆渐渐干了,泛起柔和的光泽。我趴在桌边看,看着鞋子一点点被遮住,心里的别扭也淡去几分,甚至开始盼着鞋快点儿干——那样我就能穿着“小军靴”去学校了。

那天晚上还停了电,母亲不慌不忙点了根蜡烛,顺手搁在了炉子边。烛光轻轻晃着,炉膛里透出的红光映过来,两下里一掺和,恰照在母亲低垂的脸上。她坐在炉前的小凳子上,不时伸手给棉鞋翻个面,怕烤得不均匀。额前的碎发垂下来,她也顾不上捋。炉火正旺,将她的后背烤得发红,她却浑然不觉,全部心思都在那双鞋上。临睡前,母亲又搬来两个小板凳,将鞋分放在炉火两侧,让鞋帮靠着炉壁——这样能烘得更透些。我躺在床上,闻着淡淡的油漆味儿混着蜂窝煤的烟火气,竟觉得格外安心。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总记挂着那双鞋。白天出太阳了,她就把鞋搬到窗台上晒,让阳光把油漆里的潮气烘透;日头西沉,又赶紧收回屋里,继续在炉边找个最合适的位置继续烘着。我每天放学回家,书包都来不及放下,就先凑过去看——绿色的鞋面一天比一天亮,一天比一天挺括,心里的期待也像春苗般

滋长。大概过了一周,母亲把鞋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端详良久,眼角终于漾出笑意:“这下真干透了,来,试试穿。”

我忙把脚伸进去,鞋正好合脚,暖意从脚腕处弥漫开来,把整只脚都裹得严严实实。绿色的鞋在灯下泛着柔润的光,粘锁扣上时“啪嗒”一声脆响,真像电视里军人穿的战地靴,神气得很。我穿着鞋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先前那点儿不情愿,早不知跑到何处去了。

第二天清晨,又飘起了细雪。雪不大,却把天地染成一片白。树枝上落满了雪,宛如梨花开遍;街上的积雪被行人踩过,留下一串串脚印。我穿着绿色的棉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走在雪地上,鞋底软软的,踩着雪“咯吱咯吱”响,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到了学校,同学们都围过来看我的鞋,有人说:“这鞋真好看,像军靴!”我听着,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

冬天的课间,最盼着打雪仗。我们在操场上跑着、闹着,把雪捏成球,扔向彼此,欢笑声震得树梢上的雪簌簌落下。我穿着绿棉鞋在雪地里奔跑,丝毫不觉寒冷。暖流自脚底升腾,包裹着膝盖,像母亲温热的手掌,一直轻轻地护着我。

谁知好景不长,不过两三日,意外就来了。那天下午放学,我和同学们在校门口等着家长,忽然觉得脚面上有点儿凉。低头一看,鞋面上的绿色油漆掉了一小块,露出了底下扎眼的红色。我心里一紧,赶紧用脚蹭了蹭雪,想把那红色遮住,可越蹭掉的漆越多,一块接一块,大的如指甲盖,小的如米粒。绿色的鞋面变得斑驳,红色底子

在雪地里格外刺眼。

同学们很快就发现异常,有人指着我的鞋喊:“王林强的鞋掉色啦!”接着,更多人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哎呀,里面是红色的!”“他穿女生的鞋!”那些话像冰雹砸在我心上,又冷又疼。我脸上滚烫,慌忙蹲下身,用手捧雪往鞋上盖,一层又一层,埋得严严实实——仿佛这样,就能遮住那恼人的红色。

我就那么蹲在雪地里,把头埋得低低的,听着周围叽叽喳喳的笑声,鼻子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强,咋了?”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抬头,看见母亲快步走过来,她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发丝上带着雪粒,脚上穿着一双单鞋,融化的雪水在鞋面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迹。她见我蹲在雪中,鞋被雪埋着,四周还有同学嬉笑,顿时明白了

一切。母亲蹲下,把我拉起来,用冻得发红的手拂去我脸上的雪,然后慢慢屈膝,用手一点点拨开鞋上的积雪,那双斑驳的鞋显露出来——绿漆脱落大半,红色的底色清清楚楚。母亲看看鞋,又看看我泛红的眼,没有说话,只是将我抱了起来。她的怀抱很暖,我趴在她肩上,眼泪终于决堤,洒湿了她的棉袄。母亲轻轻拍着我的背:“没事儿,强,回家。”

到家后,母亲把我放在椅子上,打来热水给我擦脸。她看着我,眼圈也红了:“强,是妈不好。明天妈就去鞋帽市场给你买双新的,咱不穿这双了。”我摇摇头,说:“妈,不用,这鞋还暖和呢。”我知道,家里不宽裕,得省出好几天的菜钱才能买双新鞋。母亲摸摸我的头,不再说什么,只是把那双鞋拿到炉边,又认真地烘起来——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些掉落的颜色一点点补回去似的。

后来,母亲还是去市场给我买了双新棉鞋,是那种最寻常的黑色,却成了我童年里最体面、最暖和的一双鞋。至于那双绿棉鞋,被母亲收进了鞋盒里,我再没穿过。可我始终记得它初染成时的模样,记得母亲守在炉边一遍遍翻动鞋面的身影,记得烛光与炉火映在鞋面上的温暖——那光和热如同母亲的爱,伴我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寒冬。

如今三十年倏忽而过,每至冬日飘雪,我仍会想起1991年的那场雪,想起那双斑驳的棉鞋。它的绿色早已褪去,红色也渐渐模糊,可它承载的爱与温暖,却从来不曾褪色。思绪还陷在回忆里,手机屏幕倏然亮起——是母亲的视频通话。我连忙接通,屏幕上立刻出现她戴着老花镜的脸庞。“立冬了,吃饺子没?”“正吃呢,您看。”我把镜头转向桌上的饺子。她笑着点点头,忽然像想起什么,把手巾拿远了些,镜头对准沙发:“你前阵子寄来的棉鞋收到了。去年那双还在柜里搁着,你又乱花钱。”我太熟悉这这套“流程”了,忍不住笑了:“是,是,以后尽量不乱花钱了。这都买了,也退不了,快试试穿合不合脚。”母亲像是被说中了心事,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弯腰,脱掉脚上那双已经穿得有些变形的旧鞋子,格外爱惜地,慢慢地将脚套进新鞋里。她特意从桌上拿了一张报纸,铺在地上,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踩上去。“嗯……大小倒是正好。就是这底子太软了,里面这绒毛也太厚了,要不还是退了把,你看我手都没直接往地上踩……”

镜头里母亲的手有些发皱,指节因常年做家务显得粗实——可就是这双手,当年曾握着毛笔蘸油漆,也曾整夜在炉边翻动棉鞋。如今她捏着新鞋的模样,依然像捧着件稀罕物,认真得让人眼眶发热。母亲总说“别乱花钱”,可我明白,那埋怨的背后,是怕我委屈了自己;就像当年那双鞋,即便掉色,也是母亲那时能给我的,最好的温暖。

小时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莫过于腊月。在记忆中,那时候的天气格外冷,大人们去生产队上工回来,眉毛和胡子上会结满霜花。车老板赶马车进城返回生产队大院,几匹老马的鼻子上都挂着长长的冰凌。然而,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却是孩子们最渴望的一段美妙时光。

“过了腊八就是年”,年关越来越近了,可我知道,家里置办年货的钱还没着落呢。但少年不识愁滋味,爹的苦娘的愁,小孩子焉能体会,我们每天掰着手指盼望年快些到来。有了过年了,能有新衣服穿,能吃上肉馅饺子,还能用压岁钱买糖块、买鞭炮。

早晨,朔风呼啸,皑皑白雪将村庄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家的小土屋,在腊月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窗外传来父亲用木锨除雪的声音,母亲则在灶膛里点燃了林秸,柴火“噼啪啪”的燃烧声,对我们来说是那样悦耳动听。我们兄妹几个蜷缩在被窝里不肯起床,不一会儿,母亲贴的一锅苞米面饼就熟了,食物的香气从门缝里飘进来。母亲把灶膛里的炭火扒出来装进泥火盆,用火铲压实后端进土屋。土屋里顿时弥漫了淡淡的烟雾,一股浓烈的柴草气夹杂着苞米面饼的香味,钻进我们的鼻孔,勾着我们赶紧穿衣起床。

往年一进腊月,村庄里各家各户便开始筹备过年了。忙碌了一年,再困难也要赶个集、上个店,买年画、买红糖、买白酒,再买一张大红纸写对联。那年是我十二岁本命年,赶上年景不好,生产队的“日值”才四毛二。这就意味着,父母上一天工还挣不到五毛钱。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兄妹四个尚未成年,家庭收入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那点儿工分。收成不好,年底不但分不到钱,还要欠下不少“三角债”。

父亲是生产队长,一心扑在队里,家里

却是全村欠“三角债”最多的。那时各生产队有穷有富,有的队地多,当家的队长精打细算,搞点儿副业,年底算账“日值”就高。有的生产队土地贫瘠,加上干部谨小慎微,秋天场院里的粮堆就小,送完公粮,仓库里的存粮所剩无几,“日值”低,社员难免要饿肚子,吃“返销粮”。

小年已过,再有几天就是除夕了,但无论如何也要让社员们置办点儿年货把年过了啊。吃罢早饭,父亲紧锁眉头倚在被垛上抽纸烟,他愁啊,队里几十户人家都眼巴巴看着他呢。还没等我吃下最后一口饼,父亲就打发我去西街喊副队长王大爷和小队会计福田哥来家,他自己去喊后院的保管员有财叔。我猜测,队委会干部聚在一起,一定是商量过年的事。我穿上父亲前些日子进城给我买的旧棉胶靴,鞋底垫上一层碎苞米皮,扣上狗皮帽子,领着大黑狗“卡藏”出了门,一路踩着厚厚的积雪往西街跑。

不一会儿,我家小土炕上就聚齐了队委会干部,几个人团团围坐,嘴里叨着纸烟吞云吐雾,都一声不吭。母亲用火铲把火盆上的炭火扒旺,给几个人沏上沫茶,墩子缸里浓浓的酃茶热气在杯口缭绕,但谁也不肯去喝一口。少顷,父亲率先端起茶缸喝了口热茶,忽然一拍大腿,斩钉截铁地说:“我打算把圈里那头伤了腿的花牯子弄

到屠宰场去卖了,然后再杀两只羊,好让父老乡亲们过年!”副队长王大爷手一抖,纸烟差点儿掉在炕上,忙说道:“怕是不成啊!上边知道了咋办?”另外二人脸上也现出惊诧的表情。父亲说:“我跟工作组老高关系不错,出了事我自己顶着,这事就这么定了!”

腊月廿五这天,是山村整个冬天里最热闹的一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出奇地暖和,有点

点儿像春天。生产队要杀羊了!要分钱

了!这消息就像一阵风,瞬间传遍了各家各户,还没等屠夫杨老三把两只羊绑好,生产队大院子里就聚满了人。老人、妇女、孩子,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人们有的挎个小筐,有的拿个小盆,恨不得马上

装好肉回家。杨老三是个猪宰羊的好手,不出

一个小时,就把肉割出来摆放在队部的长条桌上。嘎子叔先将羊肉过秤,然后扒拉半天算盘,算出每口人能分几两肉。他拿着各户的名册,谁家几口人分几斤肉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父亲坐镇

指挥,嘱咐杨老三把剔出来的羊骨头砍成小块,在案板上按户数分成小堆儿,一户一堆儿,自己挑选。旁边的大火炕上,小队会计福田哥将卖牛的钱换成零票,按户发钱。我家六口人,分到了三斤六两肉,四元二角钱。

买年货的钱有了,年三十儿锅里也有肉煮了。此时副队长王大爷也从公社粮库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队里从仓库的余粮里拨出来一些,换回点儿“细粮”。就这样,年三十儿各家各户也能包一顿白面饺子,吃一顿大米饭了。父亲站在土炕上跟大伙儿一拱手说,对不住老少爷们儿,今年只能这样了,大家明天赶个“穷集”过年吧。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已逝去二十多年,我们也从懵懂少年成为年近花甲之人。每当我想起当年父亲为了能让大伙儿过上年,被开了“路线分析会”,我总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小时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莫过于腊月。在记忆中,那时候的天气格外冷,大人们去生产队上工回来,眉毛和胡子上会结满霜花。车老板赶马车进城返回生产队大院,几匹老马的鼻子上都挂着长长的冰凌。然而,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却是孩子们最渴望的一段美妙时光。

“过了腊八就是年”,年关越来越近了,可我知道,家里置办年货的钱还没着落呢。但少年不识愁滋味,爹的苦娘的愁,小孩子焉能体会,我们每天掰着手指盼望年快些到来。有了过年了,能有新衣服穿,能吃上肉馅饺子,还能用压岁钱买糖块、买鞭炮。

早晨,朔风呼啸,皑皑白雪将村庄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家的小土屋,在腊月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窗外传来父亲用木锨除雪的声音,母亲则在灶膛里点燃了林秸,柴火“噼啪啪”的燃烧声,对我们来说是那样悦耳动听。我们兄妹几个蜷缩在被窝里不肯起床,不一会儿,母亲贴的一锅苞米面饼就熟了,食物的香气从门缝里飘进来。母亲把灶膛里的炭火扒出来装进泥火盆,用火铲压实后端进土屋。土屋里顿时弥漫了淡淡的烟雾,一股浓烈的柴草气夹杂着苞米面饼的香味,钻进我们的鼻孔,勾着我们赶紧穿衣起床。

往年一进腊月,村庄里各家各户便开始筹备过年了。忙碌了一年,再困难也要赶个集、上个店,买年画、买红糖、买白酒,再买一张大红纸写对联。那年是我十二岁本命年,赶上年景不好,生产队的“日值”才四毛二。这就意味着,父母上一天工还挣不到五毛钱。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兄妹四个尚未成年,家庭收入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那点儿工分。收成不好,年底不但分不到钱,还要欠下不少“三角债”。

父亲是生产队长,一心扑在队里,家里

却是全村欠“三角债”最多的。那时各生产队有穷有富,有的队地多,当家的队长精打细算,搞点儿副业,年底算账“日值”就高。有的生产队土地贫瘠,加上干部谨小慎微,秋天场院里的粮堆就小,送完公粮,仓库里的存粮所剩无几,“日值”低,社员难免要饿肚子,吃“返销粮”。

小年已过,再有几天就是除夕了,但无论如何也要让社员们置办点儿年货把年过了啊。吃罢早饭,父亲紧锁眉头倚在被垛上抽纸烟,他愁啊,队里几十户人家都眼巴巴看着他呢。还没等我吃下最后一口饼,父亲就打发我去西街喊副队长王大爷和小队会计福田哥来家,他自己去喊后院的保管员有财叔。我猜测,队委会干部聚在一起,一定是商量过年的事。我穿上父亲前些日子进城给我买的旧棉胶靴,鞋底垫上一层碎苞米皮,扣上狗皮帽子,领着大黑狗“卡藏”出了门,一路踩着厚厚的积雪往西街跑。

不一会儿,我家小土炕上就聚齐了队委会干部,几个人团团围坐,嘴里叨着纸烟吞云吐雾,都一声不吭。母亲用火铲把火盆上的炭火扒旺,给几个人沏上沫茶,墩子缸里浓浓的酃茶热气在杯口缭绕,但谁也不肯去喝一口。少顷,父亲率先端起茶缸喝了口热茶,忽然一拍大腿,斩钉截铁地说:“我打算把圈里那头伤了腿的花牯子弄到屠宰场去卖了,然后再杀两只羊,好让父老乡亲们过年!”副队长王大爷手一抖,纸烟差点儿掉在炕上,忙说道:“怕是不成啊!上边知道了咋办?”另外二人脸上也现出惊诧的表情。父亲说:“我跟工作组老高关系不错,出了事我自己顶着,这事就这么定了!”

腊月廿五这天,是山村整个冬天里最热闹的一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出奇地暖和,有点

点儿像春天。生产队要杀羊了!要分钱

了!这消息就像一阵风,瞬间传遍了各家各户,还没等屠夫杨老三把两只羊绑好,生产队大院子里就聚满了人。老人、妇女、孩子,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人们有的挎个小筐,有的拿个小盆,恨不得马上

装好肉回家。杨老三是个猪宰羊的好手,不出

一个小时,就把肉割出来摆放在队部的长条桌上。嘎子叔先将羊肉过秤,然后扒拉半天算盘,算出每口人能分几两肉。他拿着各户的

名册,谁家几口人分几斤肉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父亲坐镇指挥,嘱咐杨老三把剔出来的羊骨头砍成小块,在案板上按户数分成小堆儿,一户一堆儿,自己挑选。旁边的大火炕上,小队会计福田哥将卖牛的钱换成零票,按户发钱。我家六口人,分到了三斤六两肉,四元二角钱。

买年货的钱有了,年三十儿锅里也有肉煮了。此时副队长王大爷也从公社粮库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队里从仓库的余粮里拨出来一些,换回点儿“细粮”。就这样,年三十儿各家各户也能包一顿白面饺子,吃一顿大米饭了。父亲站在土炕上跟大伙儿一拱手说,对不住老少爷们儿,今年只能这样了,大家明天赶个“穷集”过年吧。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已逝去二十多年,我们也从懵懂少年成为年近花甲之人。每当我想起当年父亲为了能让大伙儿过上年,被开了“路线分析会”,我总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小时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莫过于腊月。在记忆中,那时候的天气格外冷,大人们去生产队上工回来,眉毛和胡子上会结满霜花。车老板赶马车进城返回生产队大院,几匹老马的鼻子上都挂着长长的冰凌。然而,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却是孩子们最渴望的一段美妙时光。

“过了腊八就是年”,年关越来越近了,可我知道,家里置办年货的钱还没着落呢。但少年不识愁滋味,爹的苦娘的愁,小孩子焉能体会,我们每天掰着手指盼望年快些到来。有了过年了,能有新衣服穿,能吃上肉馅饺子,还能用压岁钱买糖块、买鞭炮。

早晨,朔风呼啸,皑皑白雪将村庄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家的小土屋,在腊月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窗外传来父亲用木锨除雪的声音,母亲则在灶膛里点燃了林秸,柴火“噼啪啪”的燃烧声,对我们来说是那样悦耳动听。我们兄妹几个蜷缩在被窝里不肯起床,不一会儿,母亲贴的一锅苞米面饼就熟了,食物的香气从门缝里飘进来。母亲把灶膛里的炭火扒出来装进泥火盆,用火铲压实后端进土屋。土屋里顿时弥漫了淡淡的烟雾,一股浓烈的柴草气夹杂着苞米面饼的香味,钻进我们的鼻孔,勾着我们赶紧穿衣起床。

往年一进腊月,村庄里各家各户便开始筹备过年了。忙碌了一年,再困难也要赶个集、上个店,买年画、买红糖、买白酒,再买一张大红纸写对联。那年是我十二岁本命年,赶上年景不好,生产队的“日值”才四毛二。这就意味着,父母上一天工还挣不到五毛钱。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兄妹四个尚未成年,家庭收入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那点儿工分。收成不好,年底不但分不到钱,还要欠下不少“三角债”。

父亲是生产队长,一心扑在队里,家里

却是全村欠“三角债”最多的。那时各生产队有穷有富,有的队地多,当家的队长精打细算,搞点儿副业,年底算账“日值”就高。有的生产队土地贫瘠,加上干部谨小慎微,秋天场院里的粮堆就小,送完公粮,仓库里的存粮所剩无几,“日值”低,社员难免要饿肚子,吃“返销粮”。

小年已过,再有几天就是除夕了,但无论如何也要让社员们置办点儿年货把年过了啊。吃罢早饭,父亲紧锁眉头倚在被垛上抽纸烟,他愁啊,队里几十户人家都眼巴巴看着他呢。还没等我吃下最后一口饼,父亲就打发我去西街喊副队长王大爷和小队会计福田哥来家,他自己去喊后院的保管员有财叔。我猜测,队委会干部聚在一起,一定是商量过年的事。我穿上父亲前些日子进城给我买的旧棉胶靴,鞋底垫上一层碎苞米皮,扣上狗皮帽子,领着大黑狗“卡藏”出了门,一路踩着厚厚的积雪往西街跑。

不一会儿,我家小土炕上就聚齐了队委会干部,几个人团团围坐,嘴里叨着纸烟吞云吐雾,都一声不吭。母亲用火铲把火盆上的炭火扒旺,给几个人沏上沫茶,墩子缸里浓浓的酃茶热气在杯口缭绕,但谁也不肯去喝一口。少顷,父亲率先端起茶缸喝了口热茶,忽然一拍大腿,斩钉截铁地说:“我打算把圈里那头伤了腿的花牯子弄到屠宰场去卖了,然后再杀两只羊,好让父老乡亲们过年!”副队长王大爷手一抖,纸烟差点儿掉在炕上,忙说道:“怕是不成啊!上边知道了咋办?”另外二人脸上也现出惊诧的表情。父亲说:“我跟工作组老高关系不错,出了事我自己顶着,这事就这么定了!”

腊月廿五这天,是山村整个冬天里最热闹的一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出奇地暖和,有点

点儿像春天。生产队要杀羊了!要分钱

了!这消息就像一阵风,瞬间传遍了各家各户,还没等屠夫杨老三把两只羊绑好,生产队大院子里就聚满了人。老人、妇女、孩子,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人们有的挎个小筐,有的拿个小盆,恨不得马上

装好肉回家。杨老三是个猪宰羊的好手,不出

一个小时,就把肉割出来摆放在队部的长条桌上。嘎子叔先将羊肉过秤,然后扒拉半天算盘,算出每口人能分几两肉。他拿着各户的

名册,谁家几口人分几斤肉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父亲坐镇指挥,嘱咐杨老三把剔出来的羊骨头砍成小块,在案板上按户数分成小堆儿,一户一堆儿,自己挑选。旁边的大火炕上,小队会计福田哥将卖牛的钱换成零票,按户发钱。我家六口人,分到了三斤六两肉,四元二角钱。

买年货的钱有了,年三十儿锅里也有肉煮了。此时副队长王大爷也从公社粮库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队里从仓库的余粮里拨出来一些,换回点儿“细粮”。就这样,年三十儿各家各户也能包一顿白面饺子,吃一顿大米饭了。父亲站在土炕上跟大伙儿一拱手说,对不住老少爷们儿,今年只能这样了,大家明天赶个“穷集”过年吧。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已逝去二十多年,我们也从懵懂少年成为年近花甲之人。每当我想起当年父亲为了能让大伙儿过上年,被开了“路线分析会”,我总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小时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莫过于腊月。在记忆中,那时候的天气格外冷,大人们去生产队上工回来,眉毛和胡子上会结满霜花。车老板赶马车进城返回生产队大院,几匹老马的鼻子上都挂着长长的冰凌。然而,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却是孩子们最渴望的一段美妙时光。

“过了腊八就是年”,年关越来越近了,可我知道,家里置办年货的钱还没着落呢。但少年不识愁滋味,爹的苦娘的愁,小孩子焉能体会,我们每天掰着手指盼望年快些到来。有了过年了,能有新衣服穿,能吃上肉馅饺子,还能用压岁钱买糖块、买鞭炮。

早晨,朔风呼啸,皑皑白雪将村庄包裹得严严实实。我家的小土屋,在腊月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窗外传来父亲用木锨除雪的声音,母亲则在灶膛里点燃了林秸,柴火“噼啪啪”的燃烧声,对我们来说是那样悦耳动听。我们兄妹几个蜷缩在被窝里不肯起床,不一会儿,母亲贴的一锅苞米面饼就熟了,食物的香气从门缝里飘进来。母亲把灶膛里的炭火扒出来装进泥火盆,用火铲压实后端进土屋。土屋里顿时弥漫了淡淡的烟雾,一股浓烈的柴草气夹杂着苞米面饼的香味,钻进我们的鼻孔,勾着我们赶紧穿衣起床。

往年一进腊月,村庄里各家各户便开始筹备过年了。忙碌了一年,再困难也要赶个集、上个店,买年画、买红糖、买白酒,再买一张大红纸写对联。那年是我十二岁本命年,赶上年景不好,生产队的“日值”才四毛二。这就意味着,父母上一天工还挣不到五毛钱。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兄妹四个尚未成年,家庭收入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那点儿工分。收成不好,年底不但分不到钱,还要欠下不少“三角债”。

父亲是生产队长,一心扑在队里,家里

却是全村欠“三角债”最多的。那时各生产队有穷有富,有的队地多,当家的队长精打细算,搞点儿副业,年底算账“日值”就高。有的生产队土地贫瘠,加上干部谨小慎微,秋天场院里的粮堆就小,送完公粮,仓库里的存粮所剩无几,“日值”低,社员难免要饿肚子,吃“返销粮”。

小年已过,再有几天就是除夕了,但无论如何也要让社员们置办点儿年货把年过了啊。吃罢早饭,父亲紧锁眉头倚在被垛上抽纸烟,他愁啊,队里几十户人家都眼巴巴看着他呢。还没等我吃下最后一口饼,父亲就打发我去西街喊副队长王大爷和小队会计福田哥来家,他自己去喊后院的保管员有财叔。我猜测,队委会干部聚在一起,一定是商量过年的事。我穿上父亲前些日子进城给我买的旧棉胶靴,鞋底垫上一层碎苞米皮,扣上狗皮帽子,领着大黑狗“卡藏”出了门,一路踩着厚厚的积雪往西街跑。

不一会儿,我家小土炕上就聚齐了队委会干部,几个人团团围坐,嘴里叨着纸烟吞云吐雾,都一声不吭。母亲用火铲把火盆上的炭火扒旺,给几个人沏上沫茶,墩子缸里浓浓的酃茶热气在杯口缭绕,但谁也不肯去喝一口。少顷,父亲率先端起茶缸喝了口热茶,忽然一拍大腿,斩钉截铁地说:“我打算把圈里那头伤了腿的花牯子弄到屠宰场去卖了,然后再杀两只羊,好让父老乡亲们过年!”副队长王大爷手一抖,纸烟差点儿掉在炕上,忙说道:“怕是不成啊!上边知道了咋办?”另外二人脸上也现出惊诧的表情。父亲说:“我跟工作组老高关系不错,出了事我自己顶着,这事就这么定了!”

腊月廿五这天,是山村整个冬天里最热闹的一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出奇地暖和,有点

点儿像春天。生产队要杀羊了!要分钱

了!这消息就像一阵风,瞬间传遍了各家各户,还没等屠夫杨老三把两只羊绑好,生产队大院子里就聚满了人。老人、妇女、孩子,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人们有的挎个小筐,有的拿个小盆,恨不得马上

装好肉回家。杨老三是个猪宰羊的好手,不出

一个小时,就把肉割出来摆放在队部的长条桌上。嘎子叔先将羊肉过秤,然后扒拉半天算盘,算出每口人能分几两肉。他拿着各户的

名册,谁家几口人分几斤肉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父亲坐镇指挥,嘱咐杨老三把剔出来的羊骨头砍成小块,在案板上按户数分成小堆儿,一户一堆儿,自己挑选。旁边的大火炕上,小队会计福田哥将卖牛的钱换成零票,按户发钱。我家六口人,分到了三斤六两肉,四元二角钱。

永不褪色的鞋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

王林强